

厦 门 大 学 海 外 教 育 学 院
海 外 华 文 教 育 研 究 系 列

高丽汉诗文学史论

刘 强 / 著



GAOLI HANSHI
WENXUE SHILUN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刘 强 / 著

高丽汉诗文学史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丽汉诗文学史论/刘强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6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系列)
ISBN 978-7-5615-3044-3

I. 高… II. 刘… III. 汉语-诗歌-文学研究-高丽(918~1392)
IV. I312. 6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93449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48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肩负着向世界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当前的世界格局为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应用价值也不断提高。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现在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汉语和汉语人才。

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呼唤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研究者为其提供系统、科学、富有生机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求我们从海外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所在国的国情出发,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编写出适合海外学生的富有特色的汉语与中华文化教材。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作为国家汉办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校和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在近半个世纪的海外中文远程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我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们特组织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编写了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丛书”和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系列教材”。研究丛书力求以宽阔的视野和深入的思考,努力探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

的问题；系列教材力求较为系统地介绍海外学生应该掌握和了解的汉语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努力做到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实用性强。

我们衷心希望研究丛书和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事业添上一砖一瓦，同时也希望有关专家、学者以及使用者、学习者都能不吝赐教，以期将来进一步修改提高。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目 录

绪论 高丽汉诗文学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1)
第一章 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问题再探讨	(26)
第一节 高丽时代历史分期与文学分期的关系	(27)
第二节 对前人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的再思考	(31)
第二章 制度整備下文学的拓荒	
——对高丽建国三十年文学的重新审视	(37)
第一节 建国三十年汉诗文学独立分期的依据	(37)
第二节 对建国三十年汉诗文学的再认识	(45)
第三章 文臣世族的形成与高丽汉诗文学的兴盛	
——以高丽汉诗兴盛原因探讨为中心	(51)
第一节 光、景、成三朝改革与文治社会的形成	(52)
第二节 文臣世族与文学	
——以崔氏家族与李氏家族为例	(62)
第三节 浮靡雕琢与晚唐风	
——从几位代表诗人的个案研究看高丽中期的 整体诗风	(69)

第四节	高丽汉诗兴盛原因的再探讨	
	——以科举制、君臣唱和及私学对文学的影响	
	为中心	(88)
第四章	武人执政与汉诗文学的发展	
	——论高丽后期汉诗文学的新变	(105)
第一节	武臣叛乱原因考述	(106)
第二节	隐遁与聚会	
	——武人执政对高丽汉诗创作群体的影响	(112)
第三节	诗歌形式的新探索	
	——以集句诗、宝塔诗、回文诗在高丽中期	
	的出现为中心	(116)
第四节	宋诗学的输入与诗话在高丽中期的出现	(126)
第五章	易世动荡与文学的整合	
	——性理学下的高丽末期汉诗文学	(135)
第一节	武人政权的终结与士大夫阶层的出现	(136)
第二节	性理学与高丽末期的汉诗文学	(143)
第三节	文学的整合	
	——兼论唐宋诗风在高丽末期的影响	(152)
附录一	中国学者韩国古典汉诗文学研究综述	(162)
附录二	高丽朝世系表	(187)
参考文献		(189)

绪论 高丽汉诗文学史研究的 回顾与总结

1444年朝鲜朝世宗大王颁布韩国文字之前,韩国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①,汉字是其历史上长期使用的书面语言。汉字究竟何时传入韩国,目前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勿论箕子封于朝鲜,仅从有文字流传下来的三国时代开始算起,到韩国文字颁布为止,也有近1500年的历史。在这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韩国的先人们用汉字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所编《韩国文集丛刊》为例,已出大十六开本300辑,预计总出500辑,共收录1268位作者的文集,其中只有极少数为韩文作品。^②如此浩瀚的汉文典籍,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成就,虽然总体上与作为汉文学宗主的中国难以相颉颃,但其优秀者如李奎报、李齐贤、李穡、申纬诸人,与中国大部分一流诗人相比毫不逊色,独具风格,自成一家者亦不在少数。若进而论及“诗学”,

① 现代学者在统指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时,使用“朝鲜”还是“韩国”一直没有统一,考虑到“朝鲜”有时也指称“李氏朝鲜”这一历史时期,而且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资料及研究成果来自于韩国,所以,在本论文中,但以“韩国”为代称。

② 以上数据,为咨询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所得。

韩国学者赵鍾业先生编撰的《韩国诗话丛编》17卷,及正在编撰中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续编》,亦是煌煌巨著,真知灼见,俯拾皆是,无论是对研究韩国古典汉文学还是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于韩国文学,特别是对韩国古典汉诗文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各高校中,说到“外国文学”,则指欧美文学,讲到“东方文学”,则多指阿拉伯及印度文学。即使更进一步专论汉文化圈的东方文学,也是重日本而轻韩国。或论到韩国文学,也是多谈其《春香传》等等富于民族性的小说作品。

如何给韩国古典汉文学定位,这是本论文选题时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韩国古典汉文学是介于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因为韩国古典汉文学是“外国人”学习模仿中国文学而成,因而想当然地把它定格在中国文学“附庸”的地位,忽视其自身的价值;而外国文学研究者又因为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也把它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只是近20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到大量的韩国古典文献资料,并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域外汉文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在韩国国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也一直存在着“国语文学”与“汉文学”之争。相当多的学者抱着民粹主义的思想,极力把汉文学排除在国文学范围之外。韩国学者金学主教授在谈到国语文学与汉文学的关系时,总结当时理论界的观点,把争论各方的意见主要分为三类:1.认为只有用朝鲜文字写作的文学才能被称为国文学。2.认为纯韩文文学是狭义的国文学,汉字文学是广义的朝鲜文学领域的边缘对

象。3. 认为 19 世纪以前的汉文文学是当之无愧的国文学的一部分。^① 持第一种观念的学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韩国学界的主流,并与当时的“去汉字化运动”相呼应。反映在文学研究上,一些学者在撰写韩国文学史时,以带有强烈韩国本土特色的文学形式为对象,强调韩国民族精神的发生与发展,对汉文学或避而不谈,或轻略带过,如赵润济先生的《韩国文学史》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其实,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韩国的古典汉文学相较于韩国国语文学,都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韩国古典汉文学是韩国先人所写,反映韩国先人思想、情感与生活的作品,对它的排斥,只是在一种民族情绪驱使下的偏见;剔除汉文学的韩国文学,无疑会大大降低自身文化遗产的成就。事实证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古典汉文学研究在韩国又蓬勃发展起来,正是大批以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及学术成果的出现,才使韩国文学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韩国汉文学之中,古典汉诗是其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主流。相对来说,散文的数量也较多,但多为实用文字,纯文学作品较少。小说成就较高,但总体数量不如汉诗丰富。对于词文学,则除李齐贤外,能为之者几乎没有。诚如朝鲜初期学者徐居正(1420—1488)所言:“乐府句句皆协音律,古之能诗者尚难之。……吾东方语音,与中国不同,李相国、李大谏、猊山、牧隐,皆以雄文大手,未尝措手,唯益斋备述众体,法度森严。先生北学中

^① 琳《金学主谈朝鲜文学和汉文学的关系》,载《国外文学研究》1984 年第 3 期,第 143 页。

原,师友渊源,必有所得者。”^①其他如曲、赋作品,间有佳篇,但总体上都难以与古典汉诗相媲美。这一文学现象,与中国古典文学中五、七言诗的正统地位是相一致的。

在韩国的古典汉诗史中,高丽时代是其汉诗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如唐诗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对于海东汉诗的历史,朝鲜后期的洪万宗(1643—1725)在其《小华诗评》中有一个笼统的概括:“盖东方诗学,始于三国,盛于高丽,而极于我朝。”^②以三国时代为韩国汉诗的起始,从韩人作汉诗这一现象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仔细考查这些创作汉诗的诗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的留学人员及僧人,其创作的地点,也多在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在三国时代,汉文教育并不普及,有记录创作过汉诗的诗人数量微乎其微。真正在社会上大规模提倡并创作汉诗,有意识以汉诗表现日常生活,使汉诗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兴盛,则无疑是从高丽时代开始的。对于高丽与李朝两个时代汉诗文学成就的高下,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对此问题,洪万宗在《小华诗评》中记录了一些前人评述:

金颐叟尝语徐四佳曰:“高丽诸子,词丽气富,而体格生疎;我朝著述,辞纤气弱,而义理精到,孰优?”四佳曰:“豪将悍卒,抽戈拥盾,谈说仁义;腐儒俗士,冠冕章甫,从容礼法,君将何取?”申玄翁云:“我朝文章,非不蔚然辈出,而比之丽朝,则少逊。李文顺(齐贤)之宏肆,李文靖(穉)之浩汗,我

^① 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高丽汉诗文学集成本》,民昌文化社1994年版,第466~467页。

^② 洪万宗《小华诗评》卷上,赵鍾业编《韩国诗话丛编》第三卷,太学社1996年5月版,第493页。

朝未见。”以四佳之论见之，我朝似优；而以玄翁之言论之，丽朝似优。^①

在这一段关于高丽与李朝汉诗的比较之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一些信息：其一，高丽时期的汉诗，因为初学创作，更注重形式上词藻的华丽，对于各种诗歌体式及格律的掌握还不圆熟。但是，由于他们的诗歌没有受到更多的束缚，因而更接近于真实情感的表露，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气”更为强烈。其二，到李朝时，“诗学”相对于高丽更为发达。高丽中后期出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部诗话类著作：李仁老（1152—1220）的《破闲集》。其后，到高丽时代结束，也只有后人编辑的李奎报（1168—1241）《白云小说》、崔滋（1186—1260）《补闲集》及李齐贤（1287—1367）《栢翁稗说》三部专著。这四部著作与李朝时期繁多的诗话作品相比，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是无法相比的。这说明，在李朝时期，诗人们对汉诗的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其三，从诗人的数量上来说，李朝后出，时代更近，因而得以保存记载的诗人数目数量总体上较高丽为多，但是，如果从最优秀的汉诗作家来看，则高丽时期更占优势。东国历史上公认的四大汉诗诗人，除崔致远为三国时代之外，高丽占据其二，即李奎报与李齐贤，而李朝则仅有申纬（1769—1845）一人。此外，高丽时期的李穡（1328—1396），亦是雄文大手，其成就不在李奎报与李齐贤之下。以上三点，是我们可以从洪万宗的引文中解读出来的，此外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韩国汉诗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唐宋诗风一直是其诗歌发展的两大主流，而这两大诗风对韩国的影响，则在高丽时期已经完成。李朝的汉诗，虽然后来也受到过明代

^① 洪万宗《小华诗评》卷之上。

及清代诗歌的一些影响,但总体上不出尊唐与尊宋的嬗变。^①韩国学者金台俊先生对高丽与李朝汉诗文学的关系,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对比,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高丽汉诗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地位:

对比之下,丽朝人结成耆老七贤,交契亲密,令人想起李、杜、元、白之关系;而李朝人分东西南北各派,呼朋结党,大似洛川仿学。丽朝文学以益斋、白云为代表,温润含蓄;李朝文学以月、象、溪、泽和四佳、紫霞诗文称杰,生硬干燥。前者如春水惠泽四方,后者如夏云奇峰诡谲。^②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认为,研究韩国汉文学,对于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化,开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作为与中国无论是在典籍或人员交流,还是在思想上都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之一,对韩国汉文学的研究也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亟待加强的一个领域。研究韩国汉文学,首先要研究其作为主流的汉诗文学;而研究韩国的汉诗文学,则首先要研究其作为源头和黄金时期的高丽汉诗文学。

中国学者对高丽时期汉诗文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对高丽汉诗文学史作专门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到目

① 关于李朝诗歌的总体发展,参阅张伯伟《韩国古代诗学总说》:“大要言之,可将朝鲜朝的诗分作三期。第一期学习宋诗,主要是学习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第二期转而学唐,宗明人之说;第三期为兼采唐宋,又受到清人的影响。”载《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② 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张珏瑰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9~40页。

前为止还没一篇专文或一部专著是对这一时期汉诗文学作整体性专门讨论的。现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分散于对中韩文学交流及韩国文学的总体论述之中。就我所收集整理的材料来看,中国学者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家作品研究。对于一国文学的认识,往往是从了解其最优秀的作家开始的,中国学者在研究高丽汉诗时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目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于对高丽时期最伟大的两位汉诗诗人——李奎报和李齐贤的介绍和评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诗人的生平与创作风格,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相对较多的工作,主要论文有:许文燮《朝鲜十三世纪杰出的民族诗人李奎报及其创作评述》(载1981年《延边大学学报》第1、2期)、苏晨《朝鲜的李太白——李奎报》(载《读书》1983年第6期总第51卷)、李岩《论李奎报诗歌创作历程及其艺术风格》(载《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席永杰《13世纪朝鲜杰出的现实主义汉文诗人——李奎报》(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李海山《试谈李齐贤诗歌作品的思想倾向》(载《朝鲜问题研究丛书》1984年第4辑)、胡树森《朝鲜李齐贤和他的诗》(载《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李民佑《高丽朝鲜诗人李齐贤》(载《朝鲜史研究》1985年第6期)、包文安、席永杰《元代朝鲜族诗人李齐贤》(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温兆海《李齐贤诗美理论探微》(载《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由于中韩两国在古典文学上的特殊关系,中国学者在选题时还特别关注其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如李岩的《“海东谪仙”李奎报诗中的李白》(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邹志远论李奎报对中国文学评论的系列论文《李奎报对中国唐代诗歌创作的文学成就论》(载《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载《东疆学

刊》1997年第4期)、《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载《东疆学刊》1998年第4期)、《简论李奎报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文学成就的论述》(载1999年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2辑)、《浅析李奎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审美风格论》(载《东疆学刊》2001年第2期);王骥的《朝鲜古代诗人李齐贤在杭州》(载《西湖》1982年1月号);杨永骝的《朝鲜高丽时期的诗人李齐贤与中国》(载《亚非研究》1983年第3期)。此外,还有两篇论文是对两位诗人某一类作品所作的探讨,它们是:王弩《论朝鲜诗人李奎报的〈开元天宝咏史诗〉》(载《东疆学刊》1993年第4期)、王骥《朝鲜古诗人李齐贤咏叹江苏风光》(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4期)。

二是诗话研究。高丽中后期中国的诗话类著作传入到韩国,在高丽时期产生了四部诗话著作《破闲集》、《白云小说》、《补闲集》与《栎翁稗说》,但是从整体上看,高丽时期的诗学理论并不发达,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体系,直到李朝时期才有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徐居正《东人诗话》。目前最早一篇介绍韩国诗话的文章是苏晨发表于《读书》1980年第18期的《同岑异苔——读朝鲜诗话札记》。苏先生在该文列举了韩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诗话著作、作者及写作年代,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高丽诗话的论述,如《白云小说》系从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诗话部分抄辑而成,等等。但是,由于当时资料的不全,苏先生的介绍还有大量的遗漏。此后,蔡镇楚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上刊登了《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一文。此时,大陆学者已经掌握了韩国学者赵鍾业先生所编的《韩国诗话丛编》及李钟殷、郑珉合编的《韩国历代诗话类编》等大型诗话丛书,因而有条件对韩国诗话的特点作总体的概括。同样作为两国的诗话创始之作,中国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对比《破闲集》与中国《六一诗话》,以

证明韩国诗话与中国诗话的渊源关系。如马金科《〈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载《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徐志啸《韩国诗话〈破闲集〉与中国诗话的渊源》(载《当代韩国》1998年第三期)和《韩国诗话〈破闲集〉之中国影响论》(载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1998年创刊号)。更有学者进一步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日本,比较中日韩三国首部诗话的关系,如张寅彭发表于《中国诗学》1995年第四辑的《中韩日三国首家诗话纵横谈》,全面比较了《六一诗话》、《破闲集》及《济北诗话》三者间的异同和各自特点。以上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对韩国诗话形式本身的讨论,对于其中所含的诗学理论几乎很少涉及。目前对高丽诗论的研究,以是任范松、金东勋主编的《朝鲜古典诗话研究》一书中“高丽时期诗话研究”一编为代表。这部著作由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韩国古典诗话的专著。其中高丽部分由金东勋完成,除了对高丽时期的四部诗话的作者生平及创作背景有所交待之外,最主要的是对各书的诗学理论和诗学主张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探讨,这对高丽时期文学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是文学史研究。目前,中国学者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高丽时期文学史,更勿论高丽汉诗文学史。但是,中国学者所作的朝鲜文学史则出现了好几部,计有1957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应洙《朝鲜文学史:1—14世纪》、1983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文燮《朝鲜文学史》、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旭昇《朝鲜文学史》、1987年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朴忠禄《朝鲜文学简史》。另外,据尹充镇、金顺女《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一文介绍,还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许辉勋和蔡美花的《朝鲜古典文学史》、金柄珉的《朝鲜文学史》四部著作。此四部文学史是何

时在何出版社出版,原文中没有说明,现在我也没有看到。^① 在以上的几部文学史中,以韦旭昇先生的《朝鲜文学史》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韦先生精通韩文,长期致力于韩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韩国各体文学都有涉猎。在这部文学史中,对高丽时期文学史,作者关注更多的是其韩国国语文学的部分,对其乡歌、歌谣、传说等体式文学的发生发展,作者有一个清晰的论述;而对于其汉诗史,则更多的是流于作家作品的介绍,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并没有给予解释。除这几部文学史之外,张伯伟先生发表于《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的《朝鲜古代汉诗总说》,是研究韩国汉诗文学史的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分别讨论了三国、高丽和李朝三个时期汉诗的总貌,其中对高丽时期的汉诗,作者以丰富的材料简要说明了唐宋诗风在高丽时期的演变大概。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也不可能对高丽汉诗史加以更为全面的观照和详尽的阐述。其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学史论述,如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相关章节中的相关部分,也或有涉及,但多是平常之论,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相比而言,韩国学者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研究远较中国学者全面而深入。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现有成果都极为丰富。由于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且搜求不易,以下就我所购买收集的一些资料,举其大要,简略分类介绍如下:

一是韩国文学通史中所含高丽汉诗文学的研究。这类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赵润济《韩国文学史》(此书1948年初版,1998年由张璿瑰先生译为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赵东

① 参见尹充镇、金顺女《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载《东疆学刊》2000年第3期,第76页。